

# 近代中国史稿

《近代中国史稿》编写组

人民出版社

# 近代中国史稿

下 册

《近代中国史稿》编写组

## 近代中国史稿

《近代中国史稿》编写组

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3毫米32开本 32印张 694,000字  
1976年12月第1版 197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书号 11001·305 定价(上下册) 2.40元

(只限国内发行)

## 第八章

# 戊戌维新运动

## 第一节 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的两条路线

### 一、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

中日甲午战争后，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掠夺中国人民，攫取高额利润，争向中国输出资本，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，从而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，这就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。正如列宁所说：“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，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。”<sup>①</sup>

清政府兴办了三十多年的所谓“洋务新政”，经过了中法和中日两次战争，业已彻底破产，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已进入末世，官方再也没有财力来兴办新式企业，原有的企业因为无力支持，有的已改为商办，有的已被外资所并吞，有的奄奄一息，这就给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些隙缝，使它得以在艰苦的岁月中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。

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，动员着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。当时的爱国人士把发展工业当

<sup>①</sup> 列宁：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》，《列宁选集》第2卷，第785页。

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，他们鼓吹“设厂自救”，要求“开民厂”，抵制“洋商洋厂”。而清政府在甲午战后，因允许外资在华“设厂制造”，又为了加强反动统治，解决财政危机，需要增加税收，便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有更多的人投资创办新式企业，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。

一八九五——一八九八年间，中国商办企业有了显著的发展。<sup>①</sup>

从发展的速度来说，在这短短四年中，新创办的厂矿达六十二家之多，总投资额达一、二四〇多万元，这速度和规模都算是可以的。另外，从这期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，按年代来看，一八九五年投资为三三〇万元，一八九六年为四三〇万元，一八九七年为五七〇万元，一八九八年为四三〇万元，虽然略有波动，但总的趋势是向上发展的。再从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杭州、无锡、天津等城市历年设立厂矿的情形看，一八九五年为十七家，一八九六年为二十家，一八九七年为二十三家，一八九八年为二十家，也是向上发展的趋势。这就说明，在这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确有比较显著的发展。

从分布地区来说，民族工业的特点之一是集中性很大，集中在上海、广州、天津等大城市，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。但这绝不是说其他地方就没有，如山西祁县，有一家益新电气织染公司，资本亦达十二万元。又如广西贵县，湖北阳新，福建邵武等地，也有机器采煤业的创办，这就说明民族工业的发展虽然微弱，但终究有了一层薄薄的基础，不仅通都大邑有其影响，而且

---

<sup>①</sup> 详见汪敬虞：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第2辑，下册，第869—920页。这里应该说明两点：（1）这里只分析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这四年设立的厂矿，此前此后均不在论述之列；（2）仅采取纯粹商办的企业，对于官办，官督商办，官商合办，官办招集商股等各种类型，亦不加以论列，以便在性质上严格加以区别。

穷乡僻壤也有一点影响了。

从发展的部门来说，重工业的发展微乎其微，轻工业的发展则比较有些声势。从这期间的六十二家厂矿来说，属于重工业的有燃料采掘四家，都是煤矿，金属开采冶炼三家，其中一家是银矿，其他两家不明，机器厂一家，共计八家，所占比重不到八分之一。这里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一家机器厂，但投资仅仅一万元而已。所谓煤矿业，实际上都只是民用煤的开采，属于工业用煤的绝少，广东北海煤矿投资额最大，也只有八十三万元。轻工业能够比较快地提供利润，符合资本家的要求，这固然是轻工业发展快的一个原因，但更主要的是因为重工业多掌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手里，民族工业在重工业领域难以得到发展，只有沿着阻力较少的轻工业道路前进。六十二家厂矿中有五十四家是轻工业，其中缫丝厂多达三十四家，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，而缫丝厂又大多开设在广东顺德；纺纱厂七家，比重占第二位，如果把和它有联系的织染、轧花共三家也算在内，该是十家了，比重是六分之一强；与食品工业相联系的面粉、榨油、碾米等共七家。这就说明民族工业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轻工业，经济基础是脆弱的，不巩固的。

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，但它在小农经济的茫茫夜空中，犹如繁星点点，若隐若现，其力量是很薄弱的，加以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，发展就更加困难。帝国主义挟其雄厚的资本与廉价的商品侵入中国，在政治和经济上又享有种种特权，民族资本无力与之竞争。清政府虽然在税收上标榜“华洋一体待遇”，但实际上“洋货在其本国，大率免出口税，销至我国，完至轻之正税，其子口税名完而实免。分运熟货固如是，采购生货亦然。外商货物，成本皆轻，足以制内商之死命而

有余矣”<sup>①</sup>。这种税收上的不平等，使民族工业受到很大的打击。“无如华商智虑初开，行销未广，已成之厂，获利无多，未成之厂，集资匪易，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，深中其忌，百计阻抑，勒价停市。上年江浙、湖北等省缫丝、纺纱各厂，无不亏折，有歇业者，有抵押与洋商者，以后华商有束手之危，洋商成独揽之势。……商力甚薄，尤为惴惴，此近年商务之实在情形也。”<sup>②</sup>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帝国主义排挤、并吞中国民族工业的情形。据一八九八年海关册记载，在外国棉纱的打击下，上海中国纱厂“亏折甚巨”，裕晋、裕源等纱厂“岌岌自危，不可终日”。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，因欠有法债，后来落入法商手中；由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创办的裕晋纱厂，后来终被外商吃掉，改名协隆；由丁丙、庞元济创办的世经缫丝厂，开办不久，即于一九〇〇年停工，由日商以七万元购去。中国民族工业不仅被“洋商抑勒于外”，而且还被封建势力“阻困于内”。封建的土地制度、封建的官僚制度和清政府执行“抑民奉外”的反动政策，都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。

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期间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力量发展较为显著，而中下层力量的发展却十分有限。据不完整的统计，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创办的企业共有一〇四家，资本总额为二、三〇二万元，其中资本在十万元以下者为四十九家，占厂矿总数的四十七点一，总资本额为一

---

① 张謇：《拟请提议照约速定裁厘加税请秘密会议文》，《张季子九录》，《政闻录》卷3，第33页。

② 张之洞：《华商用机器制货请从缓加税并请改存储关棧章程折》，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卷45，奏议，第18、19页。

七三万元，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七点五强。其中资本在十万元以上者为五十五家，占厂矿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九，总资本额为二、一二九万元，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四强。资本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厂矿，多是由官僚、地主、富商和买办创办的，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保持着较多的联系，拥有的厂矿不仅数量多，而且资本比较雄厚，在商办的新式企业中占着优势。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。资本在十万元以下的厂矿，主要是由那些普通工商业者所创办的，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关系较少或没有关系，拥有的厂矿数量少，资本薄，在商办的新式企业中所占有的比重很小。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。

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力量的增长，势必要求建立一个符合于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，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，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。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，因为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比较密切，保持着较多的联系，因而选择了改良主义的道路，企图自上而下，不要发动人民群众，不要进行革命，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，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度。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，因为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比较淡薄，他们受压迫较重，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要求也比较迫切，因而选择了革命的道路，企图运用革命暴力，消灭封建君主专制制度，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。由此可见，民族资产阶级内部阶层的区分，是民族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的两条路线出现的社会基础。在十九世纪末期，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较有力量，而中下层的力量极其薄弱，所以改良路线占着优势，革命路线在艰难困苦中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。

## 二、孙中山与兴中会

资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。

孙中山（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——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），名文，号逸仙，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，曾经化名为中山樵，后来人们就通称为中山，广东香山县（今中山县）翠亨村人。他出身于农民家庭，父亲孙达成是个农民，因为家境艰难，曾经到澳门当过裁缝，以缝纫的收入来补助家用的不足。他的家乡在鸦片战争前后，既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先进地区，也是传统的反清秘密结社天地会活动的地区。太平天国起义前后，广东地区许多人跟洪秀全参加了太平军。太平军也曾几次进入广东地区活动。一八五四年，以陈开和李文茂为首的天地会起义军，曾经遍及两广各州县，几乎无一地没有这支农民军的活动。因此，在这里广泛流传着关于太平天国的口碑。幼年时期的孙中山，目睹了农民受封建剥削和外国侵略者压迫的疾苦，又常常听到太平天国革命故事，从小就在思想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，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。

孙中山的哥哥孙眉，先到檀香山当佣工，后在茂宜岛经营农牧业，逐渐上升为华侨中的资本家。一八七八年，十三岁的孙中山，随着母亲到檀香山去，“始见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，穷天地之想”。他在那里入教会学校，学习英文，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。一八八三年中法战争前夕归国，在香港皇仁书院读书，一八八六年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学校学医，一八八七年转入早期改良主义者何启所办的雅丽氏医学校学习，并于一八九二年毕业，此后即在广州和澳门一带行医。家庭出身及求

学环境,使孙中山受封建孔孟之道的影响较少,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。

中法战争的失败,使年青的孙中山受到很大震动。他怀着爱国的激情,立志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。他从此“以学堂为鼓吹之地,借医术为入世之媒”<sup>①</sup>,积极进行政治活动。他结识了一些对清朝统治极端不满的青年和会党成员。如会党人物郑士良,是他在广州博济医学校的同学,为人豪爽讲义气,后来成为他的亲密战友。陈少白、尤少纨、杨鹤龄与孙中山四人,经常在一起,“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,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,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,四人相依甚密,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,数年如一日,故港、澳间之戚友交游,皆呼予等为四大寇”<sup>②</sup>。还有孙中山的同乡、总角之交的陆皓东,也是他最初的同志。不过,这时孙中山等人所研究的“革命问题”,还跳不出改良主义的圈子,严格说来,这时他还不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。他同早期改良主义者何启、郑观应关系密切,一度受过改良思潮的影响。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,他感到民族危机严重,北游京、津,写了《上李鸿章书》,幻想得到李鸿章的支持,希望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。这里所表现的还是改良主义思想。他认为“人能尽其才,则百事兴;地能尽其利,则民食足;物能尽其用,则财力丰;货能畅其流,则财源裕”<sup>③</sup>。清政府只要真心实意地进行变法维新,改革封建专制政治,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,提倡科学技术,发展农业,振兴工矿贸易,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。由于这次投书遭到李鸿章的拒绝,加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刺激,使他更加认识到清

①② 孙中山:《建国方略》,《孙中山选集》上卷,第168、169页。

③ 孙中山:《上李鸿章书》,《孙中山选集》上卷,第15页。

朝统治的黑暗腐朽，“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”<sup>①</sup>，于是摒弃改良幻想，比较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。

一八九四年冬天，孙中山再到檀香山，在华侨中建立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——兴中会，这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式开始。兴中会起初是极端秘密的，由刘祥、何宽任正副主席，主持其事。参加兴中会的成员，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农场的华侨为主体，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人、医生、会党等，起初是二十余人，后来达到一百二十余人。有一个统计说，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前兴中会会员共一六〇人，其中有商人（包括农场主）八十六人，工人三十八人，医生三人，会党十人，还有少量的公务员、传教士、水师官兵等。<sup>②</sup>由此可见，这个组织的基本成员是中小资本家、自由职业者，还有部分劳动人民。

兴中会成立时，发表宣言说：“方今强邻环列，虎视鹰瞵，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，物产之饶，蚕食鲸吞，已效尤于接踵；瓜分豆剖，实堪虑于目前”。为了“亟拯斯民于水火，切扶大厦于将倾”，决定“联络中外华人，创兴是会，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”。<sup>③</sup>

一八九四年十二月，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邓荫南等，从檀香山到达香港，联合杨衢云、谢赞泰等组织的“辅仁文社”，于一八九五年二月成立兴中会总部，对外称“乾亨行”，以商业为掩护。孙中山此际风尘仆仆，来往于港澳和广州等地，为革命而动员会党，联络绿林豪杰，筹划起义经费，扩大革命组织，他成为职业革命家，后被会众公推为会长。他将檀香山《兴中会宣言》作了重要修改，揭发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瓜分危机，斥责了清

---

① 孙中山：《伦敦被难记》，《孙中山选集》上卷，第24页。

② 冯自由：《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》，《革命逸史》第3集，第1页。

③ 《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》，《辛亥革命》第1册，第85页。

朝统治“暴过虎狼”的罪行，大声疾呼有志之士，迅起救亡，“振兴中华”<sup>①</sup>。在会员誓词里，他提出了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合众政府”<sup>②</sup>的革命纲领。合众政府一词是仿照“美利坚合众国”而来的，合众政府就是联邦政府，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种形式。兴中会把握住了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，并且把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兴中会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。这是兴中会及其领袖孙中山对民主革命的一个贡献，也是资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改良主义路线最本质的区别。

中日甲午战争以后，广州裁撤了一批原来准备开赴前线的援军，他们因失业而愤懑不平，便加入了革命队伍。还有三元里当年抗英的团体，北江和西江地区的绿林豪杰，也都成为兴中会组织的起义力量。他们原定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，计划先由香港兴中会方面运来起义者三千人，由朱贵全、丘四等率领进广州发难，起义军以红带为号，口号是“除暴安良”，所需经费与餉械由杨衢云在香港负责经办。杨衢云想乘机夺取起义的领导权，孙中山为了团结对敌，便把兴中会会长职务让与了杨衢云。孙中山会同郑士良、陆皓东等到广州，设立秘密机关，对外称“农学会”，以研究农业科学为掩护而进行起义部署。到二十六日早晨，广州方面的起义者齐集机关待命，忽接杨衢云来电称，须推迟二日，人械始能前来。当时，因叛徒告密，风声已泄露，孙中山立即回电“止办”，但香港的复电却说：“货已下船，请接。”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得此消息后，起初并不相信。他说：“孙文一狂士耳，其创农学会，李少帅（鸿章）且赞助之，焉敢

① 《香港兴中会宣言》，《辛亥革命》第1册，第87页。

② 冯自由，《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》第18页。

造反？”后又得香港密探电告，始大惊失色，急忙调来长洲营勇一千五百人到省防卫，并逮捕陆皓东等人。二十七日，香港船到广州，船上的起义者二百多人一上岸，朱贵全、丘四等四十余人就被逮捕，手枪六百余支也被查获，余众惊散而走。这次起义经过半年多的准备，是革命党人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，其目的是夺取广州，建立革命根据地。因为步调不一致和叛徒告密，使这次起义尚未发动，即被清政府扼杀于摇篮之中。革命党人陆皓东、朱贵全等四十余人牺牲。当时孙中山、陈少白尚在广州城内，后来辗转逃出，由香港到达日本，在日本横滨设立了兴中会的分会，日本报纸大量刊载中国革命党人活动的消息。从此，孙中山名闻海内外，成为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。这次起义被称为“乙未广州之役”。

兴中会的成立，推翻清朝封建统治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的提出，并组织广州起义准备将革命纲领付诸实践，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初步形成。但是，由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经济力量还很微弱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没有形成完整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，又没有取得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支持，所以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基础极其薄弱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活动，还只限于海外华侨和广州一带，对国内政治生活尚未发生重大影响。

### 三、康有为与“公车上书”

资产阶级改良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。

康有为(一八五八——一九二七年)，原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号长素，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。他的祖父康赞修，为道光年间举人，

做过连州训导，他的父亲康达初，做过江西补用知县，可以说他是出身于地主小官僚的家庭。他的父亲早逝，幼年的康有为主要是跟着他的祖父，学习中国古代的典籍——诸子百家，但主要攻读孔孟之道的封建主义文化。一八七六年，康有为执贽于同邑大儒朱次琦门下，这个朱次琦是很崇拜顾炎武的，其治学也以经世致用为宗旨，这对康有为有着一定的影响。一八七八年，闭门探索“经世”之学的康有为，由于广泛涉猎了法家著作和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等近代名著，开始接受了通达国体、真切实用的法家思想的影响，而对韩愈之流的封建道学则产生了厌恶心理。他认为韩愈“道术浅薄，……窃谓言道当如庄(子)、荀(子)，言治当如管(仲)、韩(非)，……即《原道》亦极肤浅，而浪有大名。”<sup>①</sup>这说明青年时期的康有为，曾经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，公开谴责了封建道学而为法家说了几句好话，从而碰撞了千百年来封建统治的思想牢笼，标志着他的思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尽管他对韩愈的抨击是无关痛痒的，但却触怒了他的老师和同学，遭到了斥责和围攻。朱次琦骂他狂妄，同学说他不逊。然而，老师的怒容恰好暴露了这位师爷的儒家横暴的本来面目。康有为虽然挨了这顿没头没脑的闷棍，但他并没有裹足不前，而是在当时动荡时局的推动下，一步步地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。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，洋务派却在“自强新政”的幌子下加紧镇压人民革命，并极力阻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。但是，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，为了本阶级的政治、经济利益，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。正是在这民族危亡、社会矛盾加剧和改良思想兴起形势的推动下，遂使康有为对于那种

---

① 康有为：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，《戊戌变法》第4册，第113页。

日埋故纸堆中，皓首穷经的考据之学，逐渐发生了厌倦的情绪。他认为即使著书满架，名噪海内，又复何用？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一种新兴的学问了。

一八七九年，康有为终于离开了朱次琦，移居西樵山白云洞。这时，他一方面仍然探求所谓经世致用之学，如阅读了顾炎武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和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等，另一方面开始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，“既而得《西国近事汇编》、李□《环游地球新录》及西书数种览之。……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，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。乃复阅《海国图志》、《瀛环志略》等书，购地球图，渐收西学之书，为讲西学之基矣。”<sup>①</sup>这个年轻人在西学的影响下，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事物，并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。

一八八二年，康有为前往北京参加顺天乡试，没有考取。南归时“道经上海，……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”。<sup>②</sup>为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，康有为这时候只要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，不论什么书他都看，从外国侵略分子林乐知创办的《万国公报》，到徐继畲的《瀛环志略》，从中外地理到声、光、化、电之学，他是无不接触的。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，继承了历史上法家的爱国和主张变革的思想，经过“专精问学，新识深思……日新大进”<sup>③</sup>，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。

一八八八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，这时正是中法战后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，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的激情不断高涨。面对着这种形势，康有为写出了五千言的《上清帝第一书》，

---

①②③ 康有为：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，《戊戌变法》第4册，第115、116页。

去叩紫禁城的大门。这个三十一岁的青年人，凭着他的爱国之心，也凭着他的忠于清廷的臣下之心，指出外患极其严重，中国面临着被俄、英、日、德等国侵略的危局，清政权则腐朽堕落，民穷财尽，若不急起直追，必将外而亡于列强，内而被人民起义所推翻，变也得变，不变也得变，拖是拖不下去了。在这次上书中，他进而提出了挽救危亡的三策，即变成法、通下情和慎左右。所谓变成法，就是革除弊政，参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，结合中国当前具体情况，适当加以改变。所谓通下情，就是要了解社会中下层的动态，要给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发表意见的机会，政府要设立“训议之官”，以备谘询。所谓慎左右，就是要提拔维新人才，参预新政，罢逐顽固守旧的官僚。在这里，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人物，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，这好象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了一块巨石，必将引起一场政治波动。

布衣之士康有为的上书，轰动了整个北京的官场，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攻击。这年冬天，塘沽海口封冻，康有为暂时无法乘轮南返。于是，他留在京师，继续进行政治活动。他结识了许多比较开明的小官僚，他们后来大都成为维新派的人物，如翰林院编修黄绍箕、刑部郎中沈曾植、国子监祭酒盛昱等；并通过盛昱结识了当政的大官僚、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。他帮助都察院御史屠仁守起草奏稿，参劾醇亲王奕譞，要求停修颐和园，实际上指责那拉氏的挥霍；要求宦官不得干政，矛头直指那拉氏的亲信李莲英。此折上后，那拉氏勃然大怒，给予屠仁守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。康有为的活动，引起了顽固派的嫉视，他们加以阻挠，不肯把他的上书转达给载湉。康有为这次本来已经考中举人，但顽固大臣徐桐认为“如此狂生，不可中”，竟临时抽出了

他的考卷，使他没有考取。但康有为并不悲观，他赋诗言志说，“治安一策知难上，只是江湖心未灰”。<sup>①</sup>他把自己比作上治安策的汉代贾谊，并决心继续从事改良变法的准备活动。一八九九年十月，康有为南归。一八九〇年，他开始在广州云衢书屋（一八九一年转长兴里，一八九六年移“万木草堂”）收徒讲学，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和主张。他的弟子有梁启超、陈千秋、徐勤、麦孟华等人，其中特别是梁启超，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主要人物，后来康、梁并称。

梁启超（一八七三——一九二九年），字卓如，号任公，别署饮冰室主人，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。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，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。十五岁时，梁启超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“学海堂”，沉酣于乾嘉学派的所谓训诂词章之学，他还没有摆脱“中学”的旧框框。梁启超十七岁考中举人，一八九〇年到北京参加会试，在这里他开始看到《瀛环志略》和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外文书籍，初步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。这年他没有考取，回到广东后拜见康有为。他在康有为的启发下，“决然舍去旧学，自退出学海堂，而间日请业于南海之门”。<sup>②</sup>从此，他系统地接受了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，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。这时的康有为在广州是白天教书，晚上著书，他的学生梁启超等则一面受业，一面帮助他著作。康有为在这期间陆续完成了一批思想理论方面的著述。其中主要是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等，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《新学伪经考》是康有为的第一部理论著作，于一八九一年

---

① 康有为：《感事》，《南海先生诗集》，《戊戌变法》第4册，第336页。

② 梁启超：《三十自述》。